



早期党的活动与湖北省立一师： 历史偶遇还是文化必然

段浩伟,熊娟梅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摘要:回望五四运动前后,在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早期党的活动中,湖北省立一师是重要活动基地之一,这仅是历史际遇的巧合,还是隐藏着必然之律?偶然与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对基本范畴,省立一师办学与早期党的活动看似偶然联系,其实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文化必然,包括一师有着开放包容的学风(一流师资和理念)、兼济治平的家国情怀(爱国精神传承)、勇立潮头的求索精神(时代风气之先)、严谨求实的治学品格(办学治校翘楚)等,这些都是孕育和培养先进分子、推进早期党组织活动的重要文化基因。

关键词:湖北省立一师;早期党的活动;历史必然

中图分类号: G659.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20) 01-0046-05

五四运动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全国各地开始成立早期党的组织(党小组或党支部等),其中武汉地区的党组织以成立时间早、人员较多而走在全国前列,籍此武汉被称作“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1]“共产党武汉支部”成立于1920年夏,主要成员有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等七人,包惠僧担任书记,其中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和赵子健等五人来自湖北省立一师(或从教或求学于斯)。1921年7月,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三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翻开了中国近代史新的篇章,是中国革命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而在这十三名中共一大代表中,有董必武、陈潭秋和包惠僧等三位革命先辈,曾前后在湖北第一师范开展工作、从事活动或负笈求学,留下了宝贵而光辉的革命足迹,

在全国各院校发展史中绝无仅有。五四运动发起之后,他们又在第一师范研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武汉地区早期党组织活动,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志在革命、振兴中华的青年才俊。

作为武汉地区早期重要的党组织活动基地,湖北省立第一师范(1913-1926年)肇始于1904年张之洞创设的两湖总师范学堂(沿由原两湖书院、两湖高等学堂改办),是近代湘鄂两省最早的师范学堂之一,也是武汉乃至湖北地区规格最高、成就最大的学堂之一,^[2]开启了湖北近代新学之先风,在辛亥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更在后续革命求进之中“探时代之先声”,师范作为教育的母机,其知识文化的聚集、思想学说的传播有着天然的扩散效应。湖北省立一师有一脉相承的开放包容之学风(研习传播新思想),有一以传承的家国情怀(志在救亡复兴之道),有勇

收稿日期:2020-01-05

基金项目:2019年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党史研究项目“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革命校友党史研究”(项目编号:武城院科[2019]2号)。

作者简介:段浩伟(1982-),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城市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思政教育;熊娟梅(1966-),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城市职业学院科研处处长、教授,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心理咨询。

立潮头的先声之气(位立近代中心城市),也有严谨求实的治学品格(求真唯实经世致用)和优厚卓越的办学条件与社会影响(官办支持择优录取)等主客观因素的叠加,以及民主革命时代的风云际会,让湖北省立一师成为早期党组织活动的重要基地。

一、开放包容的校纪学风,使得省立一师成为研习传播新思想的重要阵地

一师继承了前总师范学堂“求真唯实、严谨质朴”的学风,学校有阵容强大而视野宽广的教师治学,为新思想滋生与传播奠定了开明的文化氛围;学校有学识渊博而正道包容的校长办学,为早期党的活动家提供了发展的有利平台;学校有出身寒微却好学进取的莘莘学子,他们勤学者道关心社会,思想活跃追求进步,因而产生了一大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精英才俊。

(一)师资队伍强大,教师视野宽广

学校教师的教学和学术水平皆强,教育经历和文化视野宽广。这里既有学著名儒、也有名校高才;既有海外留学生,也有外籍专家等(延续了总师学堂的国际视野),同时注重延聘社会知名学者来校讲学,因而整个学校的学术视野开放包容,各种新思想和进步学说谐和并包。教师中有治学严谨的名儒张继煦、刘凤章等,也有学识渊博的大家若黄侃(古文学家)、鲍鼎(化学家)、唐斯盛(画家)等,更有留学归来或延聘的海外教资,在1916年学校师资一览表中,共有教员40人,其中留日毕业生7人,占比18%左右,如教育学教师何膺恒毕业于早稻田大学高等师范,国文教师向大锦毕业于日本宏文师范,法制与经济教师高国煥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数学教师范恒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师范理化专业,英文教师李斯新是校长刘凤章专门从广州聘请的留美生,他们带回了海外各种新式思想学说,还有不少教员毕业于国内著名高等学府,如京师大学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洋大学等,带来了近代先进的学术理念。教师除了学历优质、兼容东西,其中不少还有丰富显著的教育工作经历。如张继煦、黄乾元、张濂尧、吴宝珩等曾就职总师范学堂教习;而孟晋祺和曹昌江曾任国立武昌高师国文和英文教员;王继昕、黄乾元、高国煥曾充任武昌中华大学教职;黄嗣艾曾任山西大学文学教员等。也有不少曾从事教育管理工作,担任湖北省内外各类学校校长,或中央地方教育部门领导。如何膺恒曾充任前学部七品京官,孟晋祺曾任咸宁师范校长,李文藻曾聘女子师范校长,傅廷仪曾为湖北教育司顾问官省立二师校长。丰富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经历赋予了学校教师宽广的教育视野,有利于省立一师建立起博学兼容、立志于教和重视社会实践的学校文化,形成了民主进步的文化传播温床。

(二)教育名宿办学,校长正道包容

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发展史表明,校长的办学思想和治校理念往往决定一个学校的发展水平,如北大蔡元培、清华梅贻琦或南开张伯苓等。湖北省立一师为湖北教育重地。纵观1913-1926年十任校长先后有郭肇明(两任)、时象晋(教育司长兼任)、张继煦、刘凤章、周之翰等,皆为湖北博学之士,盛誉其时。其中,刘凤章校长在任时间(1915-1921年)最长。因其决意反对袁世凯称帝一度辞职,之后也不愿卷入新旧派系之争再次辞职,不久因被学生热烈欢迎而返校。其在校期间整顿校务,清理派系,取消门户,招纳贤士,是朴诚勤苦的践行者,刘生活清严简朴,待人周到诚恳,若有外人来校讲学总是恭敬站立至演讲完毕,反对虚言空论,极力提倡严谨踏实、求真唯实的学风。作为“传道授业解惑”之师范园地,一师如何倡行严谨,刘凤章认为唯有“好学进取”,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六个字是为教育之真谛,至此一师勤学笃实之风日炽。1922年10月就任的另一位校长周之翰,同时也是湖北省议会议员。他思想激进,与军阀王占元有交往,之后直接促成了王占元还归一师旧址一事,极大改善学校之学习环境,1923年2月,周之翰校长聘请董必武、陈荫林、钱介馨、王仲友等党的早期知名活动家来校任教,活跃了学校的政治风气,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培养了大量革命骨干,促成一师湖北地区革命摇篮之位,周之翰校长任职两年,是一师发展的鼎盛时期。

(三)招考层层选拔,学子勤学进取

省立一师学生多贫苦人家子弟,勤学苦读志在改变家国命运,他们是从全省各地数千考生中选拔出来的优秀者,尽管学校招生考试严格,但一师美誉度和影响力仍吸引众多学子投考或转学而来。1917年2月5日,学校招收一个预科班,报考者多达700余人,校方先后组织三轮考试,最后由刘凤章校长亲自面试,综合成绩取正50人,备取35人。一师大多学子不能满足学校规定作息时间,想争取多学一些,于是备有煤油灯或蜡烛以在熄灯之后再续学至凌晨一两点钟,即使寒暑两假也勤学不辍。1915年6月,学校制定《寒暑假自修规约》,刘凤章以编写乡土志为学生暑假练习之目,寓爱国爱家、救亡图存于师范教育之中,熟悉乡土知识启迪教化民众,如通山余六鳌在一师求学期间,于1918年暑假参与编撰《通山县乡土志略》。教师也乐于指导学生假期实践,1918年6月国文教师孟晋祺、姚宗浩评阅学生寒暑假笔记及平时日记数本。正是一师教育学生勤学修身、兼济社会的责任担当,鼓励学生关心乡土、参与社会实践,为早期党的革命活动厚植了文化土壤,大批青年学子如戴克敏、张昌岐等带着先进思想,毅然回到家乡投身革命活动。

二、兼济治平的家国情怀,涵养师生民族大义与救亡复兴的气度格局

党成立于民族危难之际,在民族复兴旗帜下聚集了一群先进的中国人,志在启蒙与振兴。省立一师从校长办学、教师治学到学生求学,从校训精神、校园文化到教学理念,都承续了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和救亡之义,学校充满了民族正气,进步活动极为活跃。

(一)优秀的传统文化底蕴,矢志复兴的大义格局

省立一师继承总师学堂深厚的国学根底,延聘大批饱学之士,有如傅汝霖(前清拔贡)、李文藻(前清举人)、汉学大家黄侃等,虽其各自思想有保守或激进之分,但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如修身志业、兴亡有责、爱国如家等),始终贯穿于一师教员的教学活动之中,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不觉耳濡目染,有学生回忆“(黄侃)讲课精致透辟,声音铿锵,真可给听讲者以精神鼓舞和知识上的启发。”^[3]刘凤章校长担任修身课教学,自编讲义学材,每周日上午十点开始在一师大礼堂讲授“修身之道”,时常将书本道理和时政情势相对照,针砭时弊义愤不已。他在1920年1月18日毕业典礼讲话:“要在未来教育事业中培养脚踏实地的人,象山言,千虚不如一实,诸生试看今日,譬如口说爱国,便要具实心,求实学,营实业,增进势力,这才是与国有实际的。”^[4]据1918年秋入学的徐复观回忆,在一次修养课堂上,刘校长说,读书人要能站得起来,不能走升官发财老路,首先必须从生活俭约上立根基,生活一旦任意,便易流于放侈。可见正是以刘校长为首的教师们将传统优秀文化的“家国情怀”“求真务实”“责任担当”等民族精神贯注在自己言行中,渗透在日常课堂教学上,播撒在学生心灵世界里,才孕育了师生们深厚的文化底蕴,激发出青年学子志在求索民族复兴的大义格局,走出了武汉地区早期党小组中的五名骨干成员。

(二)鲜明的师范传道精神,孜孜启蒙的人文气度

校长刘凤章特别重视营造“好学乐教”之校风,举凡训话演讲授课,他总是要求学生,将来作为教育工作者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诸生出门,即担任教育,教育术语,鄙人记得不多,仅有六字,愿以奉赠。六字为何?即学不厌悔不倦。不仅如此,刘凤章还秉持“儒者必先治生”的教育理念,他对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教育皆以造成官吏为目的”痛心疾首,今欲立起沉痾,非大声疾呼以教育促进实业,以实业补助教育不可。^[5]他希望中国的师范教育兼备职业教育(实业教育)的功能,因此省立一师十分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生活能力的培养,“本校职教员则以国民教育之

精神,贵有职业教育之倾向。”学校提倡工业由自己做起的主张,鼓励学生由课室的手工业,扩充到带有市场性质的手工业,学生们积极响应,成立各种会社组织,小规模自制牙粉、粉笔、油墨、仪器、标本等,由学校率先采买再推之社会,同时学校设有职业教育特色的艺术科,注重工艺、美术、音乐、习字、韵学等人文教育,设置的书法、图画、手工、乐歌、游戏体操课程均是每周4小时之多。有师长的谆谆教导加上良好的学习环境熏染,一师学子勤奋刻苦、追求进步,学校图书馆二十多万册线装书,各种报刊杂志开放阅览,到图书馆借书看书之风炽盛,学生们成立读书会、证人社、觉社等社团,对知识的渴求、对教育的热爱、对时事的关注、对先进的追求和对家国的责任感,始终贯穿于一师学子的求学问道之中,贯注于教育实习和社会改造的实践之中,一师的师范传道精神,不仅是对孩童启蒙,更肩负起民族的启蒙和变革责任。

三、位处近代中心城市,赋予学校敏于新风和敢立时代潮头之勇

省立一师及其前身(两湖总师范学堂)均发起于国势待振、社会求进之时。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列强环伺分割,欧美思潮竞逐,生民流离,族群待启。内忧外患的文明古国,如何寻找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复兴之路?正是重视教育的一群中国人,心怀民族大义,力行匹夫之责,在最靠近近代化的前沿之域,感时代之先声,立思想之潮头,开风气之新变。

(一)位处文教重镇武昌城中心,感风气之先引时代之变

1923年2月,一师迁回原两湖总师范学堂旧址,无论是武昌“两湖”原址(都司湖和菱湖)还是文普通中学新址,都处于武昌城市中心地带,周围各种新式大中学校林立,如湖北省立一中、武汉中学、启黄中学、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私立中华大学(及其附属中学)等,校际之间交通便捷,交流便利,交往频繁。进步师生组织仁社、觉社、黄社、戏剧社、文学会、写生组、健学社、互助社、利群书社等革命活动,省立一师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如在1905年春,接受新思想影响的董必武,为了追求进步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辛亥革命后为了改造社会培养进步青年,应省立一师周之翰校长邀请,担任省立一师国文教师兼训育主任,正如他后来回忆说:“我们一致认为目前能够做的是办报和办学两件事,最有利于唤醒群众接近群众,而我所以要教国文,就是考虑国文是搞思想的。”^[6]又如陈潭秋1912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中学,1916年进入武昌高师学习英语,毕业后在武汉中学教书,并利用省立一师从事新思想的启蒙宣传工作,培养和影响了众多一师学子

的革命思想。早在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等即在省立一师发展青年团员,董必武还引导一师“人社”由读书团体发展到参加社会活动和爱国运动,使该社成为党的外围组织。1925年春,董必武发展一师学生陈步云为中共党员。包惠僧1917年从省立一师毕业后在武昌附小任教,同时在报刊《大汉报》《公论日报》等担任新闻记者,针砭时弊嫉恶如仇。五四运动之后利用新闻传媒,关注社会改造和思想启蒙,并于1920年2月采访了应武昌文华大学邀请讲学的陈独秀,开始学习接受和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期间与武汉地区早期党的领导人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等,往返于省立一师和武汉中学等主要宣传阵地。他积极筹划和组织群众革命活动,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和革命力量壮大,以及1920年8月党的临时支部在武汉成立打下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二)位立近代武汉开放之前沿,观社会之需促民众觉醒

武汉位于素有“敢为人先”精神的九省通衢之地,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省立一师位处武昌文教中心,也处于武汉开放前沿之地,与汉口近代经贸商圈枕江倚望,往来交通便达顺畅,较早接受近代西方各种文化理论,较早传播苏俄社会革命思想,较早关注社会改造和唤醒民众的主体意识。一师刘凤章校长极为注重教育实习,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提倡学生关注社会生活,关心乡土,实干兴邦。同时一师也有着浓厚的学术风气,事实上践行着“兼容并包”的思想导向,学校经常邀请著名教育家、知名学者和社会名流来校讲学。如1916年蔡元培先生受邀到校演讲,1919年后出席巴黎和会为青岛问题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外交官余日章先生也亦受邀讲学,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更是多次来校做专题教育演讲,此外,学校也定期邀约一些新人物、新学派和社会活动家来校讲学,如早期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李汉俊曾受邀来校演讲,他提出社会革命要有建设必先破坏,不破不立、破旧立新才有未来等。如此,这些高水平新思想的演讲活动,开阔了学生的思想视野,活跃了学校的学术氛围,激发了师生敏觉新知、追求进步文化的热情。早在总师范学堂存续的辛亥革命期间,学校就有媒体宣传和动员组织的优势,因此不少一师校友亦往来于教育或新闻报刊界,他们关注社会民生、关心民众疾苦,特别是一线劳工的基本权益,为省立一师成为早期党组织活动基地奠定社会基础。1919年6月1日,省立一师学生积极参与声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不顾军警阻挠冲出学校,参加游行和演讲,学生吴用霖在“六一惨案”中于武昌抱冰堂被军警殴伤,13日回家乡黄梅后去世,消息传回学校,7月3日,以省立一师为主力的武汉学联18个团体不顾当局阻挠,在汉口大智门召开追悼大会,

号召民众“同心努力,洗耻救亡”,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为五四运动在武汉地区的深入开展并取得斗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严谨求实的治学品格,卓越的办学影响凝聚了社会变革的力量

省立一师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承续了总师范学堂严谨扎实全面发展的育人品格,立志探求近代中国实现救亡复兴的教育之道,始终站立在时代进步的潮头之上,积极营造好学上进、海人不倦的学风精神,以朴诚勇敢、勤劳耐劳的校训作风,优良的办学条件、优厚的开办经费和卓越的办学成效,孕育和培养了启蒙思想与变革社会的先进力量。省立一师存续的1913—1926年,共培养毕业生800余名,大部分成为湘鄂两省教育文化界的骨干力量,学校既培养了诸多卓有学术建树的著名学者,如新儒学的代表徐复观等,也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培养了大批领导人,如鄂西红色政权领导人之一张昌歧,川汉沔红色政权领导人许炎生、魏人镜,黄麻起义领导人戴克敏,武汉学生运动领袖陈定一,北伐军总政治部党务秘书辛焕文等革命英才。

(一)提倡严谨求实的治学品格,精于专业发展志在社会进步

省立一师的历任校长皆饱学鸿博之士,而刘凤章校长对学校的影响尤著。刘校长以学问家的严谨,为一师承继两湖总师范的优良校风建立了功绩。学校因倡导严谨质朴而有求真唯实之风习,为学要求真,干事要务实,做人应脚踏实地。刘凤章认为虚言误国,爱国要有实心求实学营实业增实力,寄望学子在未来的教育事业的培养脚踏实地的人,“从前郭筠说的有,中国自宋代以来,人人皆尚虚谈,争虚气。儿童脑筋,本是虚空的,诸生务将一实字,灌入儿童脑筋,使步步向实地踏去。”^[4]一师的师生们都自觉地将求真务实精神贯注在教育教学之中,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修身治性,倡导朴诚简约方能真实独立,创建各种学社和团会;教师们教学中一丝不苟、严谨质朴,国文教师黄季刚先生讲解《文心雕龙》、唐宋诗词等古代文学,从不开列耀人耳目的书目清单,而从小学入手,认得字形,辨明字音,懂得字义才算明晓小学,给一师同学以巨大影响。在求真唯实学风熏染之下,师长对学生严格要求而有融融爱心,一师呈现出和谐而充实的文化氛围,课堂上学生能尽享思想上的精神愉悦,生活中也能体会到浓郁的师生之谊,英文教师李立夫先生在各地收集小物品,以及自己制作的布鞋分享给学生,汉学家黄侃先生从不摆学者的架子,待人十分亲和。严谨质朴的治学品格成就了一师优秀的教育质量。学校注重文理基础,强调专业技能、发展体育艺术、组织社团活动、鼓励社会实践。

如1920年12月毕业考试,考查科目涵修身、教育、国文、英语、图画、法制经济、农业、乐歌、体操、手工等十余门,持续一周每门3小时。1924年12月,第一部本科47人毕业,许昌年等10人平均成绩80分以上为甲等,60分以上只有1人。多年以后徐复观先生评价一师认为:“我们班上的国文程度,现时没有哪一个大学的中文系可以赶得上。”^[7]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全面发展的人文素养,涵养了一师学子追求进步、改造社会的视野和担当。

(二)凝聚匹夫有责的民族正气,爱国如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省立一师立根于师范教育(承应传统师道教化树人之责),致力于教育造端之兴(顺应社会近代化广储人才之需),关切中华民族的救亡复兴之问(不仅专注教育人才培养且启引社会进步),以其高质的治学品格、卓越的办学影响、鲜明的进步导向,凝聚起一群志在家国的青年学子,又通过文化教育、思想传播、革命活动等方式辐射和影响社会变革的发展。早在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校长刘凤章拒绝签名劝进,并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慷慨陈词“宁为保民国而死,绝不偷生拥护复辟。”同年5月7日,一师师生捐献爱国储金2700元,5月30日因激于外辱,一师邀请全省高小以上学生请愿练习兵操,并于每周研究战术半日。1916年黄兴、蔡锷等相继逝世,一师校长刘凤章曾作挽联致哀“我哭英雄,又哭英雄,英雄有几?创造民国,再造民国,民国在兹,民国在兹。”1919年4月,学校有感巴黎和会强权胜公理,学校设立国货贩卖部,以提醒师生爱国且力行。1922年,学校的几位进步学生因反抗保守势力遭反动教育当局

开除,后溺水而亡,伦理学教师钱亦石等慷慨解囊,捐款支持学生,因此也被省督军撤去教职,钱老师坚贞不屈写下《受诬停职记》,揭露督军的丑恶嘴脸,后省督军出于舆论压力欲让其复职,遭其断然拒绝。除了以身作则、言行示范,师长们还通过课堂启迪学子心智,如钱亦石讲授的《伦理学》和《生理卫生》等课程,常常渗透启示社会进步的思想,甚至开设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讲座,以启迪学子们的革命理想。董必武在一师教授国文,他新编教材讲义,将秋瑾、徐锡麟的诗文、易卜生的戏剧、莫泊桑的小说等编入其中,摒弃陈腐内容而摄入进步思想,在课外引导学生社团“人社”由读书修养团体,升格为关注社会发展、参加爱国活动的进步组织,为省立一师成为武汉地区早期党组织活动重要基地,及至成为湖北“革命的摇篮”,打下了坚实思想和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 [1] 田子渝.武汉五四运动史[M].武汉:长江出版社,2009.
- [2] 涂文学.百年薪火 桃李芬芳——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校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
- [3] 徐复观.关于黄季刚先生[J].政治评论,1963,(3).
- [4] 校长训词[C].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1920:4.
- [5] 北洋政府档案: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B].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2020:544-546.
- [6] 吴炳权,吴时壮.董必武与武汉中学[M].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12.
- [7] 徐复观.纪念刘凤章[N].华侨日报,1981-06-01.

[责任编辑:石俊华]

Hubei Provincial First Normal School and Early Party Activities: Historical Encounter or Cultural Inevitability

DUAN Hao-wei, XIONG Juan-mei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City Polytechnic, Wuhan430064, China)

Abstract: Looking back before and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the spread of Marxism and early Party activities in Wuhan, the Hubei Provincial First Normal School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activity bases. Is this just a coincidence of historical communication, or is it a law of necessity hidden? Contingency and necessity are a pair of basic categories of Marxism. It seems that there is a casual connection between running Hubei provincial First Normal School and the early activities of the Party. In fact, there is a profound cultural necessity behind them, including an open and inclusive style of study (first-class teachers and concepts), combination of family and country feelings (patriotic spirit inheritance), a spirit of seeking for prosperity (the forerunner of the times), a rigorous and realistic character of learning (the leader of running a school) and so on, which are important cultural genes for nurturing and cultivating advanced elements and promoting the activities of early Party organization.

Key words: Hubei Provincial First Normal School; Early Party Activities; Historical Inevitable